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



张云 (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是1953年首先在山东省滕县岗上村遗址发现的,近50年来,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在山东以及江苏北部地区,已经发现大量含有彩陶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这些丰富多彩的彩陶艺术品,犹如闪耀的繁星,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充分显示出古代艺术大师卓越的创作才能。

—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在器形方面,主要器形有觚形杯、单把杯、尊形杯、单把杯、钵形鼎、豆、单把豆、罐、壶、背壶、釜、器座、盆、钵、单把钵、碗、鼓、鬲、盂等。色彩主要有黑、白、红、褐、赭、黄等诸色。据研究,赭红可能就是赭石。黑色可能是一种含铁很高的红土,白色可能是一种配入熔剂的瓷土。在烧制方面,已开始利用氧化焰、还原焰来赋予陶器以各种不同的色调。花纹图案主要以植物纹和几何形纹样为主,未见鱼、蛙等动物以及人物纹样。主要有花瓣纹、八角星纹、菱形纹、卷云纹、云雷纹、太阳纹、水波纹、辐射条纹、圆点纹、圆圈纹、宽带纹、折线纹、人字纹、斜线纹、平行线纹、网纹、三角纹、勾连纹、连栅纹、方格纹、连弧纹、母字编织纹、饕餮纹、贝纹、涡旋纹、饕餮纹等。这些花纹图案,结构复杂巧妙,题材丰富多样,一般以平行线作界隔,中间绘三角纹或网纹。其中折线纹、花瓣纹、八角星纹和勾连回漩纹最具特色。

这些花纹图案一般都有固定的器物组合,如花瓣纹一般施在盆、钵、鼓、器座以及个别壶或罐上面。是由花瓣、圆点和线条等组成的花朵连续图案,花瓣相互连接,组合巧妙。勾连纹一般装饰在盆和钵等器物上面。由圆点、勾叶、互边三角形线条等组成,个别为单彩,多数为红褐或红黑腹彩。八角星纹是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具有代表性的花纹图案,大部分绘在豆和盆上面。涡旋纹多施在鼎、壶以及单把杯的腹部,多黑地白彩,亦有红地白彩。云雷纹则施在扁腹钵的上腹部或豆的盘和柄处,常以深褐色地,再填连续的

白彩方形规整图案。水波纹由一条或多条横向平行弯曲的线条组成,形成水波状,多红地黑彩,一般饰在鼎的腹部。折线纹常装饰在扁腹钵的上腹部,多在红色或褐色地上绘出首尾相接的方折线图案。卷云纹并不多见,仅在大墩子陶鬲上发现过,这种纹饰一般饰红衣,绘黑彩,形成连续卷云纹样。网纹是大汶口文化彩陶中常见的一种花纹图案。主要施在鼎、背壶、罐、盂、杯等器物上面。三角纹常与网纹相间使用,也有单独构图者,多施在壶和背壶的上腹部。连栅纹纹饰发现较少,主要施在陶钵或器座上面,上部以白彩绘连山纹,套饰毛边菱形纹,衬褐色地,折腹处施多道白彩直线纹。母子编织纹仅在邹县野店遗址发现过。用深褐色彩在钵的内外侧各画三个等距相同的单体母子编织图案。这是大汶口文化中唯一施内彩的器物。斜栅纹使用比较普遍,多施在高足钵形鼎、罐形鼎、三足盂、壶、盆等器皿上,一般在深褐色彩带上画白色连续斜栅纹。太阳纹则表着深紫红色陶衣,然后用白彩绘一个空心圆圈,圆心露紫红色陶衣,似太阳,两侧各绘一道白彩空心。饕餮纹是大汶口文化中不常见的一种纹饰,构图较复杂,施喇叭口罐腹部,口施紫衣,腹挂白衣,用褐彩绘繁褥的几何形图案。其装饰部位,一般都有固定的位置,多数不通体饰彩,花纹图案主要装饰在器物的中上部,即施于器表的显著部位,尤其是肩部绘以丰富多彩的图案,而下腹部至底部除少数有简单的花纹外,绝大部分没有花纹图案。因为在古代人们大多席地而坐,或直立行走,人们这样进行装饰,正是他们最容易看到的部位,所以能起到最好的艺术效果。如有的彩陶盆、钵、豆等器物要在口沿上部绘制一周花纹图案,以增加装饰艺术效果和艺术感染力。据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花纹几乎都描绘在器高二分之一以上位置,而在器高五分之二以下部位一般不画彩,这反映出史前时期人们在彩陶制作中有着强烈的功利

性。

二

大汶口文化的彩陶, 不仅数量多, 而且器类复杂。下面选择比较典型的精美彩陶进行介绍:

觚形杯 王因 M4002: 3, 全器涂红衣饰黑彩。彩纹共分三组, 每组由+字线、圆点、弧线三角形和红陶衣一起构成红色花瓣纹图案, 每组花瓣还附有 2 个斜向的桂叶形花纹。通高 16.5、口径 12、柄径约 6 厘米(彩版一, 5)。

釜 大汶口 M2007: 32, 泥质红陶。敛口, 平唇略向内凸。球形腹, 小平底。腹部两侧附对称小横耳。唇面用白色和熟褐色两彩相间绘凹边三角形组成的叶形图案。腹部以深红色作彩地, 绘等距六个熟褐色圆形, 每个圆形又用白彩画八个方心云雷纹(回字纹), 将圆形作四等分成为团花状图案, 再以白色彩线勾连各组团花, 构成一幅色彩艳丽, 构思独特的画面, 全器通高 30.8、口径 32.4、腹径 41.2 厘米(彩版一, 2)。

盂 大汶口遗址出土(M26:5), 敛口, 圆腹, 平底, 口沿下装一上翘的管状流, 腹部外鼓处饰对称鸡冠耳或板纽两个。口沿向里平折, 腹缓折, 折腹以上绘黑彩, 口沿部涂黑色宽带, 中间空出竖道为段, 口沿下黑色宽带间空出复道连三角纹。通高 13.4 厘米(彩版一, 1)。

鼎 广饶五村遗址出土(M55: 2), 侈口, 束颈, 折腹, 扁足, 肩附双鋈。颈腹肩施赭彩, 绘涡旋纹。线条流畅, 色彩艳丽。通高 24.2、口径 16.5 厘米(彩版一, 3)。

豆 泰安大汶口(M2005: 49), 通体施深红色陶衣, 豆盘沿面绘白色彩地, 其上用熟褐、赭红等彩绘出半月形若干竖线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五个方心八角星状纹样, 在星星之间均由两列竖线分格。圈足在熟褐色彩带上绘一圈白彩连续折线图案。通高 26.4、口径 24.4、圈足径 15 厘米(图见封底)。

器座 大汶口遗址出土(M2007: 34), 用熟褐色、红色两彩绘凹线三角纹, 卵点并用白彩勾边, 构成四瓣花式图案, 每两朵花之间各加红色弧线组成花蕊状图案。通高 12、上径 15.2、下径 19.6 厘米(彩版一, 4)。

鼓 大汶口遗址出土(M1018: 24), 尖唇, 敛口。束腰式长筒腹。下腹内折呈大平底。上腹部近口附加一圈鸟喙形凸泥饰。腹和底部各穿有小圆孔, 腹部的作两两对称分布, 底正中有一小孔。腹部用白色、深

红色和熟褐色等三种彩色, 分两层分别绘弧线三角纹和卵点, 组成四瓣花图案。底腹之间又饰一圈锯齿状刻纹。通高 41、口径 30 厘米(彩版一, 7)。

盆 王因遗址出土(M2326: 4), 口沿及上腹涂红陶衣, 口沿沿面上又以白色涂地, 绘有七组花纹, 每组有两个蓝色的弧线三角纹错向构成长方图案, 填红色对角线及圆点反衬出白色叶状或花瓣形花纹。七组花瓣纹之间又填以红、黑相间的五至七条短线。腹部的纹样是在红色底彩上绘以连贯的类似的山字形的折线并折线间填以毛边菱填以带毛边的菱形白色线纹, 形成最醒目的花纹带。在主花纹带之下又饰一周竖短白线。通高 16、口径 25.3 厘米(彩版四, 2)。

壶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这件彩陶壶(M1014: 30), 为棒口、斜颈, 圆腹, 小平底。腹部着桔黄色陶衣, 绘白、深红和黑(熟褐色)等三色组成连续弧边三角形、卵点等纹样, 构成五瓣花样的彩色图案, 色泽艳丽, 器表光泽。通高 16.5、口径 3.5、底径 3.5 公分(彩版四, 3)。

背壶 大汶口遗址出土(M10: 57), 侈口, 长颈, 圆肩, 深腹, 腹壁一侧拍平, 装环形鼻一对, 另侧装一小竖鼻, 平底。通体绘黑白彩花纹, 颈口部涂一周黑彩, 颈间绘三个等距的黑白彩同心圆, 肩部为黑地白彩的简单涡纹, 上下界以白色弦纹, 腹部绘黑彩镶边的三角形, 一大一小, 相对交错, 近地处为两周黑地白色圆点纹。通高 17.4 厘米(彩版四, 4)。

碗 茌平尚庄遗址采集 4(采: 13), 直口, 直腹, 下腹内收, 小平底。内外施红陶衣, 上腹绘两组以赭色为地, 内填白色网纹的交错三角形图案, 每组十四个三角形。口径 14、通高 6 厘米(彩版四, 1)。

钵 兖州王因遗址出土(M2376: 13), 泥质陶, 通体涂红陶衣。口沿外有一周凹陷, 可承盖。圆肩, 深腹斜收, 小平底。全器周身花纹分为三组。腹部三分之一以上又涂白彩为地, 再以蓝、褐色的弧线和三角勾连纹反衬出白色纹样, 更配以红色圆点纹, 形成繁缛的图案。通高 14.3、口径 15.7 厘米(彩版四, 6); 大汶口遗址出土(M2011: 4), 泥质红陶, 敛口, 圆纯凸起, 宽圆肩。腹壁斜直内收, 小平底。肩部施白彩作地, 绘深红色和黑色等彩的弧线三角形、直线及卵点等纹样, 组成球形(或呈圆灯笼样)的图案。色泽艳丽, 图案醒目。通高 12、口径 16、肩宽 23.6、底径 5.6 厘米(彩版四, 5)。

三

关于大汶口文化彩陶的制作工艺, 根据对仰韶

文化彩陶制作工艺的研究,得出了两大类五种方法的结论。两大类是手制和轮制技术,五种方法则是手捏成型法,泥条盘筑法,内模成型法,外模成型法和拉坯成型法。其原料多选择泥质陶,夹砂陶较少,因为泥质陶质地细腻纯净,杂质较少,而且一般选择经过黄河及其支流河水自然淘洗沉淀的黄粘土和红土,因而结构紧密,坚固耐用。关于彩陶的烧成温度,根据重烧对比试验观察,在烧至900℃时,陶质的硬度和色料的颜色等,均无显著变化。因此,当时的烧成温度可能在900~1000℃之间。

陶坯制作过程中,器表还要进行磨光处理,使之光滑细腻。为了陶器上绘彩方便,以及掩盖陶器表面粗糙裂纹等缺陷,陶工们还要在陶器表面着一层红或白色泥浆作为衬地(俗称陶衣),陶衣的运用,其目的是使器表色泽更加均匀,一方面利于绘彩,另一方面也能提高陶器表面的致密度。上述工序完成后,才开始绘制花纹图案。首先把颜料石研磨成粉末,然后用天然胶状物调成浆糊状,涂在陶器表面,最后再绘制各种绚丽多彩的花纹图案。也有的彩陶在绘彩后,再用细软的物质反复打磨器表,使绘彩部位细密发亮,富有光泽,达到抛光的效果。所采用的绘彩方法,主要分为二种,其一是入窑前先用类似毛笔一类的工具在陶坯上进行绘彩,再入窑烧造,这样生产的彩陶坚固耐用,可以使色彩与胎面融合一体,因而色彩不容易脱掉,就是融水颜色也不会脱落。二是将陶器烧好后再着色上彩,由于颜色没有经过焙烧,因而与坯体粘接不牢,颜色容易脱落,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彩陶叫彩绘陶器。刘林、大墩子遗址出土的彩陶器皿大多是彩绘陶器,以此花纹图案很容易脱落。

绘制彩陶的颜料,是一种含有大量的石英(SiO_2)、较多的赤铁矿(FeO_3)、较少的磁铁矿(Fe_3O_4)的天然赭石。这种赭石,目前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经常发现,邳县大墩子遗址墓102内曾发现五块绘制彩陶的颜料石,形状呈不规则状,质地坚硬且分量重,表面圆浑光洁,而且都有研磨的痕迹,如果用水沾湿石块,在粗石上面进行研磨,磨下来的粉末,就立即显出深浅不同的赭红色,其色泽与彩陶上的红色完全一致。这就是当时大汶口文化先民们从事彩陶生产所用的染料。由于自然界中大量存在这种天然赭石,又易于采集,所以一直被人们长期使用。对于这种颜料,古代文献中也有记载。《诗经·邶风》:“赭如屋赭”。《说文》“赭,赤土也”。《尚书·禹贡》中,也有“黑土、白土、赤土、青土、黄土”的记载。这里

说的“赤土”指的也是天然赭石。总之,红色燃料——赭石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古代原始社会的手工业和着色颜料的种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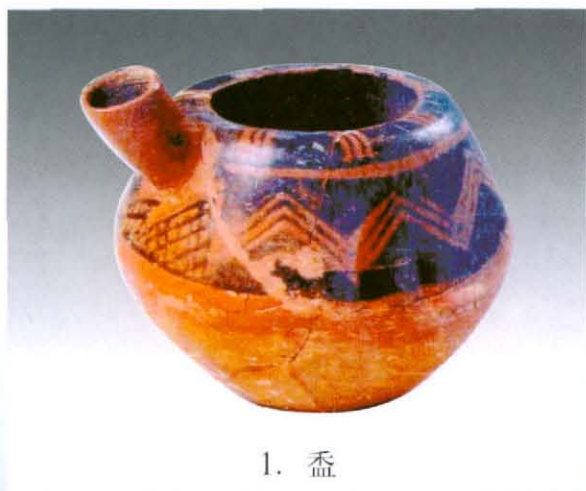
另外,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彩陶器物上流利的线条观察,其笔法圆润,线条流畅,图案规整,证明当时人们已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彩绘各种图案了。从众多的彩陶纹饰笔痕分析,有的器物上面的宽带纹宽二、三厘米,而有的器物上面的细线条仅有几毫米,近似模印,证明不是一种笔所能绘制。由此推断当时的绘画工具可能非常类似现代的毛笔。这类画笔不容易保存,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现。但大墩子遗址出土的15件骨帽,为我们了解当时是否使用画笔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些骨帽,均呈圆锥形,后段挖出空腔,而且磨制光滑,近似现在的毛笔套。另外,在刘林遗址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一件陶质多窝小盘,为夹砂红陶,略残,呈椭圆饼形,表面捺出许多小窝,颇似现在的调色盒。由此来看,大汶口文化时期彩陶的生产,从陶土的选用、颜料的配制以及各种彩绘工具的使用等,都已经具备了。彩陶的制作已经从其它手工业部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业性生产部门。从绘画角度观察,当时在制陶业内部已出现了“专职画师”,他们与制作陶坯的工匠显然有着不同的分工,各司其职,“专职画师”负责在制好的陶坯表面绘画花纹。

四

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彩陶,不仅地方特征非常明显,而且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发展道路。既有规律又富于一定的变化。器表装饰大多施红色陶衣,少数挂有白衣。早期色泽主要是黑陶,中期常见红、赭和白色并用,晚期黑白兼施。早期纹饰运线较粗率,布局不甚严格协调。中晚期线条匀称,制作工艺趋向细腻。花纹图案以几何形纹样为主,习见以平行线作界隔,中间绘折线、波纹、网纹、圆圈、菱形、花瓣和勾连回旋纹等。彩陶数量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直至消失;花纹图案由简单到繁褥,再由繁褥到简单;色彩搭配由单彩到复彩,再由复彩到单彩;在这一发展变化的整个过程中,发现许多优秀的彩陶艺术作品,其中有的是及其珍贵的艺术瑰宝,一度成为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辉煌的艺术成就,展现了我国原始绘画艺术丰硕成果,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周广明)

天边的彩云——大汶口文化彩陶



1. 盃



2. 釜



3. 鼎



4. 器座



5. 觚形杯



6. 鼓

天边的彩云——大汶口文化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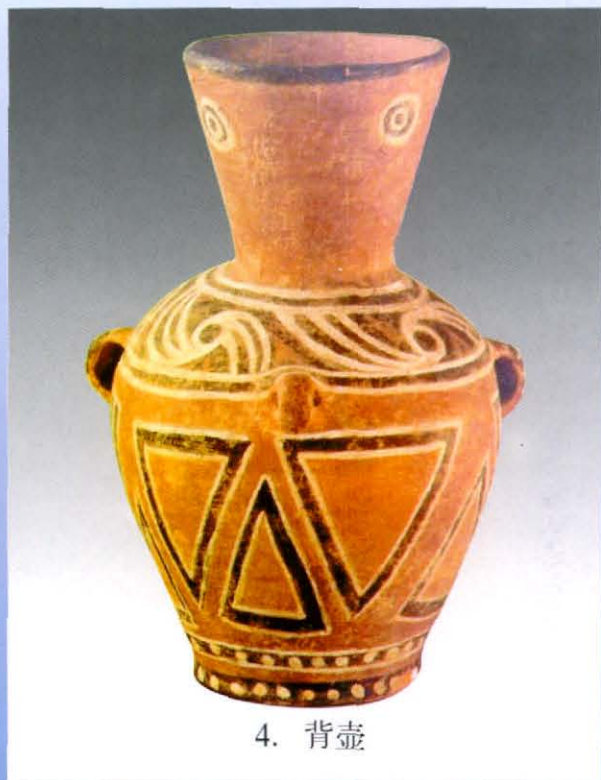
1. 碗



2. 盆



3. 壶



4. 背壶



5. 钵



6. 钵

封面题签：苏秉琦

天 边 的 彩 云



大汶口文化彩陶豆

(张 云 供稿)

I SSN 1004-6275



10 >

9 771004 627005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来源刊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来源刊

国内外公开发行人 ISSN 1004—6275 CN 36-1170/k

国内定价：¥8.00